

龔立人 2017年1月10日



每次帶中國同學去台灣考察和旅遊時，他們總希望到台北故宮一行。因為故宮在中國人心中有特別地位？還是因為他們要清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罪狀呢？至於台灣人對故宮的感受又如何？在北京故宮下，台北故宮是文化項目還是某種政治意識的象徵？至於香港人對故宮的感情又如何？

我絕對有興趣去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認識其故事、建築和文物，就正如我會參觀不同國家的博物館。至於要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一事，我沒有興奮，只有愕然。這正是當下香港爭議事件之一。

程序公義不是絕對，但必須

簡單來說，於2016年12月23日，香港政府公佈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決定牽涉兩項關注：第一，程序公義。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十九條列明，

在不損害第21(3)(a)

)條的原則下，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

那麼，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否一件合適事宜作公眾諮詢？這肯定是，無庸置疑。條例沒有規定要用甚麼合適方法諮詢。這是可理解的，因為有些事宜較適宜用公開比賽，有些事宜較適宜用公廳會。在受公眾輿論壓力下，於2017年1月5日，香港政府宣佈用六星期展開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和持份者對博物館設計和營運，以及其展覽和教育活動的重點方向的意見。

這是否符合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是焦點之一，因為這所謂諮詢不牽涉是否可以推倒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決定。或許，很多人不明白為何有香港人總吹毛求疵，不懂變通，不懂欣賞中國政府的善意和香港政府的努力。然而，當重溫九七後香港的事件簿時，我們就會明白為何程序公義是這麼必須。

1. 在2000年，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的情況下，把鋼綫灣

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與李澤楷的盈科拓展，意圖發展成類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中心。此舉引起官商勾結的

指控。更重要，已建成的數碼港證明它是一項地產項目，沒有甚麼高科技。這是一項高科技包裝下的地產項目。

2. 2010年的興建高鐵事件。雖然在這事上，香港政府依足程序公義而最後通過興建高鐵，但高鐵並非為香港人需要而興建，只是要配合中國高鐵發展的需要。

香港政府善用玩弄權勢，即它按自己需要決定甚麼事宜按程序做事，甚麼事宜可繞過程序。雖然程序公義不保證有好的結果，但在一個沒有民主監察的政府，程序公義強調的公開與透明度成為民間社會維持社會公義重要方法之一。所以，持續追擊政府在這事上違規不是為反對而反對，而是不讓政府自把自為。

故宮符號

故宮是一種軟實力。簡單來說，軟實力指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例如，中國政府已在不同國家設立孔子學院，藉推廣中國文化（教授普通話），建立中國國際形象和改變他人對中國的態度。

至於香港，中國政府如何發揮其軟實力？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也。第一，因香港人仍存有一定的中國情，很多香港人會歡迎故宮文化博物館在香港興建，並引以為傲。當感性高於理性時，程序公義變得不重要了。第二，從文化角度來看，沒有太多人會質疑故宮文物的歷史價值。相反，質疑故宮文化是作賊心虛，甚至被指為泛政治。在這兩種先天條件下，觀賞者從欣賞故宮文化漸漸地認同它所傳遞的信息，即中國文化是偉大，中國在香港的地位，認同中國人身分，並減少對中國政府的抗拒。再者，當旅遊業成為很多地區重要收入之一時，故宮附帶著的旅遊收益更難令人抗拒。商業世界是一個認錢不認人的世界，拒絕故宮文化博物館在香港興建就是破壞香港經濟。

誰人需要故宮文化博物館在香港？香港市民需要，因為他們需要被提醒，香港人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所以，重點不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文物，而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符號所指涉的。香港人的需要是被建構出來的需要。查實，故宮文物在香港已展出多年，香港沒有特別需要要有獨立博物館。事實上，故宮文化博物館興建後，保安費和日後營運費將是一大財政負擔。沒有政治考慮就沒有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考慮。在港興建故宮博物館不是中國政府送給香港回歸20年的大禮，而是對香港主權的宣示。

當香港政治制度已被一國主導，經濟生活也慢慢被中國資金影響時，想不到文化生活也逃不出被主體的命運。

符號再符號

若符號牽涉指涉的話，下一個問題將是如何在既定符號中涉入另一層意義，以致可以發揮黑格爾所說主人奴隸辯證法。猶太 - 基督宗教傳統對此並不陌生。例如，已亡國的以色列人將其信仰傳統涉入於巴比倫創造故事中，寫出其創造故事（創世記1章1節~2章4節）。這拒絕被主體的行動建立其主體性。

又例如，基督門徒將其信仰價值涉入十字架刑具中，改變暴力與和平、失敗與勝利、死亡與復活的邏輯。那麼，被主體的香港人可以從基督宗教學到甚麼想像，從被主體到主體呢？